



# 跨越194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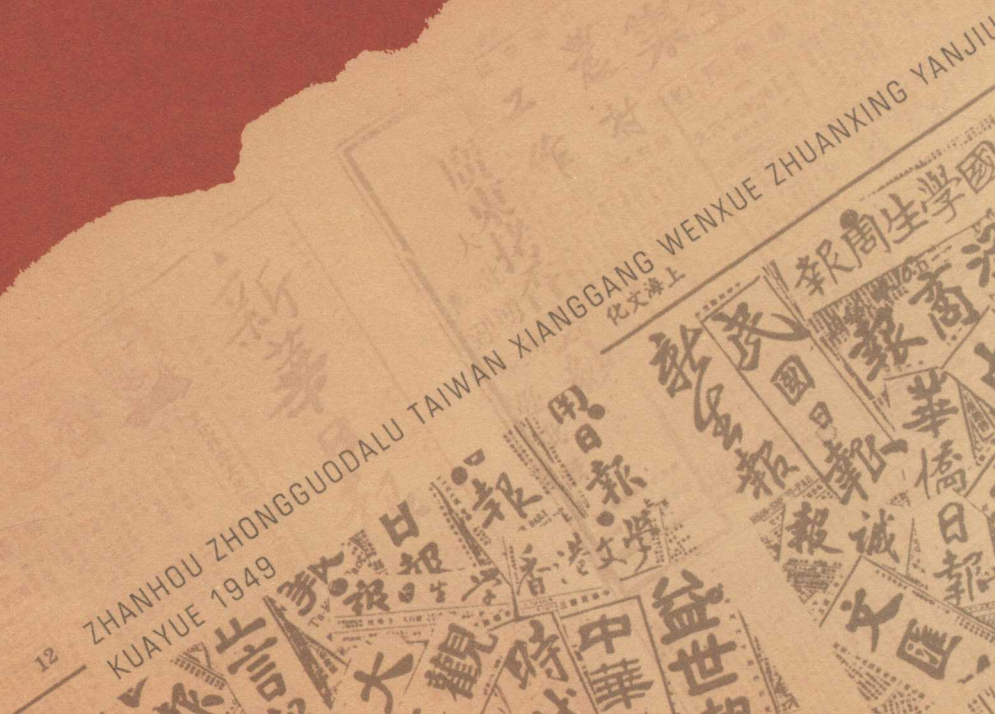
战后中国大陆、台湾、香港  
文学转型研究 ①

黄万华 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 HUA 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12 ZHANHOU ZHONGGUODALU TAIWAN XIANGGANG WENXUE ZHUANXING YANJIU  
KUAYUE 1949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SHING FUND PROJECT

# 跨越1949

战后中国大陆、台湾、香港  
文学转型研究 ①

黄万华 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跨越1949: 战后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文学转型研究 / 黄万华著. —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8.9  
ISBN 978-7-5500-2903-3

I. ①跨… II. ①黄… III. ①中国文学-现代文学-文学研究  
②中国文学-当代文学-文学研究 IV. ①I206.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8) 第140759号

跨越1949: 战后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文学转型研究

黄万华 著

---

|       |                            |
|-------|----------------------------|
| 出 版 人 | 章华荣                        |
| 选题策划  | 童子乐                        |
| 责任编辑  | 童子乐 张 越                    |
| 书籍设计  | 方 方                        |
| 制 作   | 何 丹                        |
| 出版发行  |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
| 社 址   | 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898号博能中心一期A座20楼   |
| 邮 编   | 330038                     |
|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
| 印 刷   | 江西华奥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
| 开 本   | 720mm×1000mm 1/16 印张 42.75 |
| 版 次   | 2019年3月第1版第1次印刷            |
| 字 数   | 700千字                      |
| 书 号   | ISBN 978-7-5500-2903-3     |
| 定 价   | 128.00元 (上、下册)             |

---

赣版权登字 05-2018-281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邮购联系 0791-86895108

网 址 <http://www.bhzwy.com>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 影响阅读, 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 目录

导论 跨越“1949”：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历史一体性和丰富  
差异性 / 1

## 上 编

第一章 互为参照中的战后中国文学转型 / 21

第一节 互为参照：战后中国文学转型中的大陆、台湾和香港文学 / 21

第二节 战后中国左翼文学的三种形态及其文学史意义 / 38

第三节 “内化”中的“缝隙”：战后中国文学建制变化和文学转型 / 60

第四节 文图：战后文学史叙述的新途径 / 74

第二章 中国大陆：从多种流脉到一统格局 / 90

第一节 瑞恰慈和战后平津地区文论：战后中国文学重建的多种流脉 / 90

第二节 创作：跨越“1949”的政治、历史分水岭 / 110

第三节 文学的生存限度：文艺政策和文学创作 / 126

第三章 台湾：战后政治高压缝隙中发生的多种文学思潮 / 147

第一节 去殖民性进程中的战后初期台湾文学 / 147

第二节 大陆赴台作家和光复初期台湾文学重建的两种方向 / 164

第三节 “二二八”文学：战后台湾文学的重要转折 / 177

第四节 1949年后台湾政治高压缝隙中发生的多种文学思潮 / 190

#### 第四章 香港：在传统中展开的文学转型 / 210

第一节 “预演”：1945—1949年的香港文学 / 210

第二节 左、右翼政治对峙中的香港文学思潮和香港文学主体性建设 / 226

第三节 战后香港文学：在传统中展开的文学转型 / 242

第四节 从《文潮》（上海）到《文艺新潮》（香港）：战后香港文学转型的文学史线索 / 256

#### 第五章 媒介和战后中国文学转型 / 275

第一节 上海—北京：从媒介生态看战后中国大陆文学转型 / 275

第二节 非“二度漂流”：1950年代的台湾文学及其媒介 / 292

第三节 青年文学刊物：战后香港文学转型的重要基石 / 310

### 下 编

#### 第六章 战后中国文学转型中的作家选择 / 331

第一节 “京派”的“终结”和战后中国文学的转型 / 331

第二节 文学立场的坚守和艺术实验的艰难 / 350

第三节 文学常识的力量：与内地“工农兵文艺”和台湾“战斗文艺”分手的香港文学 / 362

#### 第七章 跨越“1949”的诗歌创作 / 373

第一节 被忽视的新诗成熟年代：1945—1949年的中国大陆新诗 / 374

第二节 1950年代后大陆诗歌的文学史经验 / 390

第三节 战后台湾政治压抑下的诗歌突围：“中国传统”和“善性西化” / 402

第四节 从“左翼”到“现代”：战后香港诗歌交汇中的延续和综合 / 429

## 第八章 跨越“1949”的小说创作 / 446

第一节 写什么和怎样写：战后中国大陆小说的生存和发展 / 446

第二节 战后台湾小说：边缘突围中的多种叙事 / 467

第三节 战后香港小说：超越政治化和商品化的本地化进程 / 505

## 第九章 跨越“1949”的散文和戏剧创作 / 531

第一节 时代性和个人性：1949年后的大陆散文 / 531

第二节 “集体旅行”中投向域外的目光 / 541

第三节 台湾散文：五四多种流脉的战后拓展 / 564

第四节 “在”与“属”的相容和转化：战后香港散文的主体性建构 / 582

第五节 “第四种剧本”：1950年代大陆戏剧文学的突破 / 600

第六节 现代与传统的沟通：战后台湾、香港的“新戏剧” / 611

## 第十章 转移和转型：“离散”中的作家创作 / 627

第一节 跨越“1949”：刘以鬯和香港文学 / 627

第二节 上海—台北：中国新诗现代化路径的探索者纪弦 / 638

第三节 “三级跳”：战后至1950年代初期张爱玲的创作变化 / 656

## 后 记 / 673



## 下 编

走向和命运。

## 一、战后多种文学路向中“京派”的文学“重建”和左翼的政治批判

在抗战胜利后“重建”中国文学的多种路向中，原“京派”成员重新聚合并延续、发展了其“京派”主张的文学实践反映了战后中国文学最重要的一种走向。“京派”成员在抗战期间虽然星散各地，但其建设性的积累始终没有停止。这种积累在战后初期加速展开，甚至形成“京派”可能再度崛起的态势。尤其是1946年5月，西南联大宣布复员，原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师生各回其校，平津地区更迅速聚合起包括沈从文、朱光潜、杨振声、废名、李长之、卞之琳等在内的原“京派”重要成员，并接纳了原平津沦陷区包括沈启无、朱英诞、南星等在内的作家（1946年6月创刊于北平的《文艺时代》就是沦陷区作家为“京派”战后在北平文坛重新活跃而做的一种努力，其成员有北平沦陷时期很有影响的作家吴兴华、毕基初、常风等，朱光潜等“京派”成员则活跃于这一刊物），原“京派”主要刊物《大公报·文艺副刊》及《文学杂志》（1930年代，正是由于沈从文“编《大公报·文艺副刊》”，朱光潜“编商务印书馆的《文学杂志》”，“把北京的一些文人纠集在一起，占据了这两个文艺阵地，因此博得了‘京派文人’的称呼”<sup>①</sup>）复刊，“京派”倾向的报刊阵地开始产生广泛影响。1946年是抗战爆发后平津地区创办文学刊物最多的年份，共30种，比此前文学刊物问世最多的1939年还多9种。而跟抗战胜利前国统区文学刊物百分之七十属于左翼刊物的情况不同，此时平津地区文学刊物大部分在政治上以中立姿态出现，这为“京派”的重新聚合提供了空间。抗战胜利后仅仅一年中，原“京派”成员在京津地区主持的刊物就有《益世报·文学周刊》《平明日报·星期艺文》《现代文录》《经世日报·文艺周刊》《民国日报·文艺》《北平时报·文园》等10余种重要刊物，沈从文一人主编4种文学副刊。而原“京派”成员积极参与其中的刊物如《华北日报·文学副刊》

<sup>①</sup> 朱光潜：《从沈从文先生的人格看他的文艺风格》，《花城》1980年第5期，荒芜编：《我所认识的沈从文》，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1页。

## 第六章 战后中国文学转型中的作家选择

下编从作家、作品的角度展开战后中国文学转型的考察。本章关注战后中国文学转型中的作家选择。1949年前后中国作家所经历的社会变革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种全新的社会制度开始建立，而原先的社会制度又未完全退出中国舞台。在世界性意识形态对峙的背景下，两者之间的复杂纠结、激烈冲突形成巨大的压力，作家的选择必然前所未有地复杂、艰难。

### 第一节 “京派”的“终结”和战后中国文学的转型

抗战时期文学淡化了左翼时期文学派别的对峙，同时形成了战时多中心区域文学格局，如延安的以政治体制的主导力量和作家创作追求的一致性而构筑成的解放区文学中心，重庆等地在政治体制的主导力量跟作家创作追求的抗衡性中形成的战时现实主义文学的中心，昆明、桂林等地主要依靠内迁的学院文化、学术力量形成的自由主义文学中心，北平、上海等地在战前文化积累上重新构建的沦陷区文学中心（起码在通俗小说传统的突破、城市地域文化的认同等方面，其自有重要价值），甚至香港、东北等也各自有中心态势。这种多中心区域文学形态还是一种播散态势，甚至在二战的背景上向海外繁衍，表明中国现代文学开放性体系的某种形成，也为战后中国文学多种路向做了准备。抗战胜利后，文学“重造”的课题被提出，作家的各种文学主张及其实践得以展开，其中“京派”的复苏及其终结反映了战后中国文学转型中作家选择的重要

性的解放与恢复”，是想掩蔽人民和统治者之间“对立的存在或阻止这对立的发展”，“这样就把统治者的罪恶的责任轻轻刷掉了”。<sup>①</sup>这里，任何文学的立场都被视为政治立场的选择，正如郭沫若当时直言不讳的，“凡是有利于人民解放的革命战争的，便是善，便是是，便是正动；反之，便是恶，便是非，便是对革命的反动。我们今天来衡论文艺也就是立在这个标准上的”<sup>②</sup>。二是批判“京派”对新文学史的“歪曲”，认为“京派”只是“冒充出一种为‘文学’而‘卫道’的假面目”，五四后的新文学“只能停留高级知识分子群中”；只有“近一二年来，才使中国化得到实践”，<sup>③</sup>而这中国化就是“文艺必须为劳动者服务”的“大众化”<sup>④</sup>（劳动者对于文艺的需求又往往被简化为“被文艺所动员起来革命”）。这实际上已涉及文学史的评价了。这两方面的内容已包含了日后左翼阵营掌控文学的重要模式，表明左翼阵营对“京派”的批判带有文学全局性的考虑，而当时“京派”作为“自由主义的文化人”在左翼文人眼中“已成为共产党在文化战线上的头号敌人”。<sup>⑤</sup>因此，“京派”文学在左翼阵营批判中的终结过程构成战后中国文学转型的重要内容，其包含的两条文学“重建”的路线之间的分化、斗争深刻反映了受国共战事的政治制约而又跨越了“1949”的中国文学的命运及其实质。

“京派”在战后基本上还是一个自由主义作家派别，强调在政党对立之间，“保持一个中立的超然的态度”，“能从四面八方着眼，大公无私，稳健纯正”，形成一种“平正的、健全的、有助于社会安定的”舆论；在“自由分子的势力在今日中国几乎被剥削完了”的战后情势中，“京派”把“不属于任

① 荃麟：《初秋杂笔》，（香港）《自由丛刊》第7辑《展望大反攻》（1947年10月），郑树森、黄继持、卢玮銮编：《国共内战时期香港文学资料选》，（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9年版，第227、228页。

② 郭沫若：《斥反动文艺》，《大众文艺》第一辑《文艺的新方向》，（香港）生活书店1984年版，第3页。

③ 孟超：《朱光潜的粗疏》，（香港）《小说月刊》第1卷第5期（1948年11月）。

④ 林洛：《人民文艺的指导理论》，《大众文艺新论》，（香港）力耕出版社1948年版。

⑤ 郑树森、黄继持、卢玮銮编：《国共内战时期香港文学资料选·三人谈》，（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9年版，第19页。

《文艺复兴》《文潮月刊》《观察》《文艺丛刊》《小说》等起码也在10种以上，这实际上已开始形成以原“京派”骨干为核心的一种文学力量。在战后中国文学的多种路向中，“京派”主张及其创作实践在其自身深化中成为延续五四文学传统、重建民族新文学的代表性力量，但也再次引发其与左翼文学阵营从潜在到显在的冲突，并导致了其在中国大陆的终结。

“京派”终结的重要标志就是大家熟知的那篇郭沫若的“檄文”——《斥反动文艺》。这篇“短兵相接”的批判文章只点了三个人的名字：沈从文、朱光潜和萧乾，其锋芒直指“京派”毋庸置疑。有意味的是，郭沫若自供，对于朱光潜的文章，“在十天以前，我实在一个字也没有读过。为了要写这篇文章，朋友们才替我找了两本《文艺杂志》来”<sup>①</sup>。这表明，郭沫若的文章不仅有着明显的“价值预设”，而且服从着一种深广的组织背景。事实上，“斥反动文艺”是中共领导下的左翼文化战线在香港发动的一场着眼于全国夺取政权的运动。此前，1947年7月，焦菊隐、叶丁易等积极支持的北师大刊物《泥土》第三辑刊出的《文艺骗子沈从文和他的集团》的批判文章，将沈从文、朱光潜、卞之琳、郑敏、穆旦、袁可嘉等列入“北平沈从文集团”，表明左翼阵营已充分关注到沈从文等自由主义作家在战后平津地区活动的“集团性”。但此时平津地区左翼文学的影响并不很大，一些在北平刊物发表文章的左翼文人往往远在沪、渝等地。有组织的批判运动恰恰是在拥有相对和平宽松环境而又聚合了大批南来左翼文人的香港发生了。1948年下半年，在香港出版的左翼刊物，如《自由丛刊》《野草丛刊》《大众文艺丛刊》《小说月刊》等，都发表了痛斥以沈从文、朱光潜、萧乾等为代表的“反动文艺”的文章，作者则包括当时著名的左翼文人冯乃超、林默涵、邵荃麟、孟超等。文章主要批判了《文艺杂志》《大公报》刊发的内容，显示出左翼阵营和“京派”的直接对峙。批判的主要内容大致分两个方面展开。一是揭露“京派”文人的“政治立场”，认为“京派”在“人民的发现”已替代了“人的发现”的时代潮流中倡导“人

<sup>①</sup> 郭沫若：《斥反动文艺》，《大众文艺》第一辑《文艺的新方向》，（香港）生活书店1948年版，第5页。

之别，没有什么新旧左右之别”。<sup>①</sup>《文学杂志》展开了其在战前没来得及充分展开的“自由生发，自由讨论”<sup>②</sup>的文学实践，在“中国病象很深沉”的战乱年代，他们把“思想的自由生发”视为接受“西方文化的精髓”，根治中国人，尤其是“文”“弱”的中国知识分子“因循苟且”的病根的根本途径。<sup>③</sup>《文学杂志》无疑是当时质量最高的文学杂志之一，它所刊发的沈从文、废名、毕基初、汪曾祺、艾芜、雷妍等的小说，冯至、朱自清、朱光潜等的散文，穆旦、林庚、废名、袁可嘉、林徽因、孙毓棠等的诗作，李健吾、徐盈等的剧作，常风、朱光潜、李长之、萧乾、袁可嘉、王佐良等的评论，不仅探索的路径各不一样，而且都不乏佳作，完全可以代表战后中国文学达到的水平。其实，《文学杂志》对于文学的接纳确是“宽大自由”的，左翼作家徐盈就是在《文学杂志》发表作品文体最多的一位作家。沈从文多次称徐盈在“做人、应世、看社会、测未来”上都可做他的“老师”；<sup>④</sup>认为在民族、国家“重造”的问题上，徐盈的意见“也比目下许多专家、政客、伟人，来得正确可靠”；<sup>⑤</sup>甚至认为徐盈、罗子冈（徐盈之妻，也是中共地下组织成员）教育青年，“比张东荪或梁漱溟有益得多”，“而做人方面”青年更能学徐盈、罗子冈，“可无从学史良或罗隆基！”<sup>⑥</sup>在文学创作上，《文学杂志》和其他“京派”刊物更是努力促使“大家各从不同方式、不同信仰、不同观点作去，有个长时期自由竞争，争表现，所谓文坛会丰富些，思想也会活泼些”<sup>⑦</sup>。正

① 编者：《复刊卷头语》，（北京）《文学杂志》第2卷第1期（1947年6月）。

② 朱光潜：《我对于本刊的希望》，（北京）《文学杂志》第1卷第1期（1947年5月）。

③ 朱光潜：《苏格腊底在中国（对话）》，（北京）《文学杂志》第2卷第6期（1947年11月）。

④ 沈从文：《复彭子冈》（1946年12月27日），《沈从文全集》第18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446页。

⑤ 沈从文：《复黄灵——给一个不相识的朋友》（1946年末），《沈从文全集》第18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450页。

⑥ 沈从文：《复彭子冈》（1946年12月27日），《沈从文全集》第18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447页。

⑦ 沈从文：《致彭子冈》（1946年12月上旬），《沈从文全集》第18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444页。

何一个党派”的“优秀的自由分子”的存在看作国家面临“在朝党”和“在野党”冲突“恶化”、“引起内乱”之时中国命运所系。<sup>①</sup>而在文学上，他们更坚持思想自由、艺术本位的立场。即便在遭到左翼阵营的严厉批判后，他们初衷不改，坚持“自由是文艺的本性”，“问题并不在于文艺应该或不应该自由，而在我们是否真正要文艺”，因为“惟有在艺术的活动方面”，人才要“完全服从他自己的心灵上的要求”，从而“充分表现了人性的尊严”，并产生“解放可能被压抑的情感”，“解放人的蔽于习惯的狭小的见地”的创造力，文艺的创造性就是“自主自发”，因此“没有创造性或自由性的文艺根本不成其为文艺”。<sup>②</sup>这种自由的文艺观是充分的，现实针对性也是明显的，就是“我们不能凭文艺以外的某一种力量（无论是哲学的，宗教的，道德的或政治的）奴使文艺……我们不能凭某一个人或某一部分人的道德的或政治的主张来勉强决定文艺生展的方向……文艺自有它的表现人生和怡情养性的功用，丢掉这自家园地而替哲学宗教或政治做喇叭或应声虫，是无异于丢掉主子不做而甘心做奴隶”<sup>③</sup>。战后的“京派”倡导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旗帜最鲜明、立场最充分的自由主义文学观。由此出发，他们全面展开了战后中国文学的“重建”。

最能表明“京派”文学主张延续、发展的刊物自然是《文学杂志》。这本停刊十年后于1947年6月复刊的刊物不仅重申了原刊“一种宽大自由而严肃”的办刊方针，即“认清时代的弊病和需要，尽一部分纠正和向导的责任”，“使人人在自由发展个性之中”，“养成爱好纯正文艺的趣味与热诚”，勇于在新文艺上“作分途探险的工作”；<sup>④</sup>更针对“国家民族”“空前的大难”之中，“一些本来与文学无缘的人们打着文学的招牌，作种种不文学的企图”的现实，强调文学是“一个国家民族的完整生命的表现”，“文学上只有好坏

① 朱光潜：《自由分子与民主政治》，原载《香港民国日报》1947年12月22日，《朱光潜全集》第九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303—306页。

② 朱光潜：《自由主义与文艺》，原载《周论》第2卷第4期（1948年8月），《朱光潜全集》第九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480—481页。

③ 朱光潜：《自由主义与文艺》，《朱光潜全集》第九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482页。

④ 朱光潜：《我对于本刊的希望》，（北京）《文学杂志》第1卷第1期（1937年5月）。

亡迫人疯狂方式以外，于科学和艺术观点上，建设一个进步理想或一种进步事实”。<sup>①</sup>当“现代文学三十年”进入“终结”时，沈从文力图从历史的梳理中找到文学的生发力。

1948年1月的《文学杂志》刊出的朱光潜《现代中国文学》，更是“京派”建构新文学史的一次努力。作者认为“现代中国文学”是在中国“教育方式的变革”“政体的变革”中，“在全民族的生活里吸取滋养与生命力”的结果；“由古文学到新文学，中间经过一个很重要的过渡时期”，就是梁启超、严复、章士钊等的“新文言”时期。关于白话文运动之后的文学实绩，此文在新诗方面讲了胡适、闻一多、徐志摩、卞之琳、冯至、臧克家等的努力和不足；在小说方面肯定了鲁迅、沈从文、芦焚、沙汀、茅盾、巴金等的成绩；在戏剧上称赞了丁西林、曹禺的作品和洪深、李健吾的改编剧，对郭沫若等抗战期间的戏剧则持批评态度。文章肯定最多的是翻译文学，林纾、周作人、胡适、耿济之、曹靖华、梁实秋、袁家骅、朱湘、梁遇春、熊式一等近20位翻译家进入了“努力很可观”的行列。这份新文学史的名单显然与左翼话语的文学史观是针锋相对的。对于这三十年的思潮，文章专门谈到了“左派和右派的对立”，认为原先“在白话文的旗帜之下，大家自由写作，各自摸路，并无一种明显的门户意识”，左翼文学及其组织起来后，“不‘入股’的作者们于是尽被编入‘右派’”，并批评左翼阵营有“许多没有作品的‘作家’和许多不沾文学气息的文学集会”。对于中国文学的努力方向，文章强调了不能“承受西方的传统而忽略中国固有传统”，认为“中国过去的文学，尤其在诗方面，是可以摆在任何一国文学旁边而无愧色的”，而“文学是全民族的生命的表现”，更要与“这长久的光辉的传统”“有历史的连续性”。<sup>②</sup>仅就此文的新文学史观而言，“京派”强调文学变革的渐变、文学在传统展开中“转型”的思想，正是在宰制性左翼话语面前对新文学成果的小心保护和用心维系。

① 沈从文：《谈现代诗》（原题《新废邮存底 三五七——谈现代诗》，载1947年12月15日北平《平明日报·星期艺文》第34期），《沈从文全集》第17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478、479页。

② 朱光潜：《现代中国文学》，（北京）《文学杂志》第2卷第8期（1948年1月）。

是《文学杂志》这种“宽大自由”的实践及其产生的广泛影响，引起了左翼阵营的不安，引发了他们有组织的批判运动。对于别人的批判，“京派”似乎仍以“不变”应对，相信创作能说明一切，恰如当时沈从文所言：“扫荡沈从文……想必扫荡得极热闹。惟事实上已扫荡了二十年，换了三四代人了。好些人是从极左到右，又有些人从右到左的……我还是我。在这里整天忙。”<sup>①</sup>然而“京派”此次错了，他们面临的是一次以政治宣判为背景的大批判，他们宣扬的“思想的自由生发”已与即将在全中国建立的政治、文化新规范无法兼容。

战后“京派”与左翼阵营的“交锋”自然也涉及五四后文学史评价这一重要课题。从未结集出版诗歌的沈从文此时期却反复与人探讨新诗创作，评述新诗历史。他将“新诗分作五个阶段”，看重“五四时代诸作”的“启蒙性”；“‘新月’时代如徐志摩，朱湘，闻一多”等的诗作“企图把握到语言节奏的本性”，“得到相当成功”；“第三期”的“戴望舒、臧克家、何其芳、卞之琳几个人的成就”，使现代诗的“试验又有了新的发展”，“作品中则个人性格凸出”；抗战时期，“高兰、王亚平、彭燕郊、艾青对朗诵诗各有贡献”；到40年代，“如冯至，杜运燮，穆旦”等“又若为古典现代有所综合，提出一种较复杂的要求”。<sup>②</sup>这种新诗史的梳理，不仅从诗本体的层面上凸现了诗的时代性和个人性的结合，而且在文学史建构上显示了个人性的筛选眼光。至于他选择诗歌来谈新文学史，也许想表明他以“旁观者”身份表现个人性眼光的“客观性”。沈从文并不否定政治与诗的关联，他看重的是一切都要经过诗人个人性的眼光，所以他“对于诗与政治结合不仅表示同意，还觉得应再进一步”，那就是“诗人不是为‘装点政治’而出现，必需是‘重造政治’而写诗！”，那就是在政治正“导演着民族无可奈何的悲剧”时，“在驱人死

① 沈从文：《复李霖灿、李晨岚》（1947年2月初），《沈从文全集》第18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465页。

② 沈从文：《谈新诗五个阶段》（原题《新废邮存底 二五八》，载1947年7月20日北平《明日报·星期艺文》第13期），《沈从文全集》第17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456页。

回避“统治无能引人民人流血过程”的现实，只是他们对现实有更深切的人文关怀：“作者能对此同归于尽之现实局面注入较多哀悯，比从作品中掘发仇恨意义更深远。”政治斗争“十年廿年后，这些人都不免恩怨相消，同入虚无，功名权位，成尘成灰。然万千新生人民，却将依旧寄托于这一片广大土地上，无论作主人，作奴隶，总得勉强活下去！就活到这一片由于烈火焚灼刀兵摧毁之破碎荒芜土地上！现代伟人政治家或思想家若留给他们的，又是那么一个悲惨景象，现代文学家是不是还应当给他们一点别的东西……增加他们深一层认识，由悔悟产生勇气，来勇敢的克服面临一切困难，充满爱与合作精神，重建这个破碎国家”。<sup>①</sup>这事实上是“京派”最根本的文学观深化的现实形态。他们在区分文化和政治中再次选择了文学作为抗衡现实压力、重建民族的途径，以“自然人性”来对抗战争毁灭。其中包含的勇气、执着难以想象，然而“京派”做到了。

战后“京派”孜孜以求的是建立一种“北方传统”。这种传统，“比上海方面用杂文、辱骂、造谣方式吸引读者情形，结果将不同些”<sup>②</sup>；也不同于和政治联姻的文学，“因为政治是最怕‘反对’，而特别需要‘拥戴’的”<sup>③</sup>。废名甚至认为“少年人贪写文章，是不立志”，也是担心少年人落入“急乎乎做著作家”的习气中。<sup>④</sup>他们视文学为“古人能令我们现在人喜欢，我们现在人也应该令后来人喜欢”<sup>⑤</sup>的艰苦事业。沈从文当时花费大精力去编

① 沈从文：《致周定一先生》，原载北平《平明日报·星期艺文》第23期（1947年9月28日），原题《窄而霉斋废邮（新十九）》，《沈从文全集》第17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472—473页。

② 沈从文：《复叶汝珪》（1947年2月14日），《沈从文全集》第18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471页。

③ 沈从文：《致彭子冈》（1946年12月上旬），《沈从文全集》第18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444页。

④ 废名：《立志》，原载《华北日报·文学副刊》1948年2月15日，止庵编：《废名文集》，东方出版社2000年版，第275页。

⑤ 废名：《立志》，止庵编：《废名文集》，东方出版社2000年版，第275页。

## 二、“北方传统”中“自由”的“无界限的开辟新荒”

但仅仅“保护”“维系”显然是不够的，“京派”的重新聚合要做的是突破和发展。1946年10月《大公报·星期文艺》创刊时，杨振声发表《打开一条生路》，在废名等撰文响应后，他又强调，怎样打开生路，一是“以融会的精神培养成文艺的基础”，要“打开新旧文艺的壁垒”，“打开中外文艺的界限”，甚至“打开文艺与哲学及科学的疆界”；二是“面临着今日世界的新趋势，人类在冲突矛盾中所遭遇的新命运，以创造的精神……综合中外新旧，胎育我们新文化的蓓蕾以发为新文艺的花果”。<sup>①</sup>这里讲得虽有些笼统，但“自由”的“无界限的开辟新荒”<sup>②</sup>确是当时“京派”打开生路的最重要的努力，这种努力才构成“京派”与宰制性的左翼阵营及日后日益单一的体制之间内在深层次的矛盾。

沈从文、废名、朱光潜、萧乾，乃至汪曾祺等作家战后初期都非常活跃，二战的胜利使他们在希望中加速了其在抗战后期就开始了的文学突破，他们在可惜于“抗战八年”的“悲壮伟大场面”“本应有三十五十部《西线无战事》作品，事实上却一个还没有”<sup>③</sup>的文坛现状的同时，开始了诸如沈从文要写“十城记”那样的创作努力。而国家政治的动荡使他们更执着于文学的建设作用。早在国共内战全面爆发之前，他们就忧心于国家社会“正陷入一种新的可怕的纷乱中”，担心“十五岁就玩政治，二十岁就吃政治饭的早熟中国青年”更会在这种纷乱中“大规模作不必要的牺牲”，因此强调在“国家的和平与幸福”被战争毁灭时，更要坚持“一种争夺以外的教育，用爱与合作代替夺权势来解释‘政治’二字的含义”，认为“凡是能对当前病态现实有否定作用的文化迷，于明日都有其异常庄严的意义”。<sup>④</sup>面对战乱动荡，“京派”并未

① 杨振声：《振声按》，（天津）《大公报·星期文艺》第8期（1946年12月1日）。

② 杨振声：《振声按》，（天津）《大公报·星期文艺》第8期（1946年12月1日）。

③ 沈从文：《致镇潮》（1947年初），《沈从文全集》第18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456页。

④ 沈从文：《定和是个音乐迷》，原载《大公报·文艺副刊》第49期（1946年8月20日），《沈从文全集》第12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209—214页。